

傅斯年



马亮宽 李泉 著

傅大炮、傅老虎，
轰遍高官显要，
真学问、真胆识，
道尽古今中外

A Biography of Fu Sinian

红旗出版社

傅斯年

传

马亮宽 李泉 著

Biography of Fu Ssün-an

红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傅斯年传 / 马亮宽, 李泉著.

—北京: 红旗出版社, 2009. 5

ISBN 978-7-5051-1761-7

I. 傅… II. ①马… ②李… III. 傅斯年 (1896 ~ 1950) - 传记

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4824 号

书 名: 傅斯年传

著 者: 马亮宽 李 泉

责任编辑: 粟博莉

责任校对: 李 娟

装帧设计: 耀午书装

出版发行: 红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

邮 编: 100727

E - mail: hqcbs@publica.bj.cninfo.net

编 辑 部: 64068163

发 行 部: 64037154

印 刷: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97 千字 印 张: 21.75

版 次: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51-1761-7

定 价: 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| 目录 |

001 一 求学岁月：贯通中西学问

当时北京大学传统国学章太炎学派势力强大。傅斯年深厚的国学功底，尤其对章氏之学的信从，引起一些太炎弟子的看重，刘师培、黄侃等人都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，希望傅斯年能够继承仪征学统和章太炎学说，成为他们的衣钵传人，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后继有人，并将其发扬光大。傅斯年初期亦想在国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，入本科不久，便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。据记载，傅斯年当时常穿大袍褂，拿大葵扇，俨然一个地道的儒生。

- ◎ 家世与家学 / 2
- ◎ 国学奠基 / 8
- ◎ 五四运动的旗手 / 21
- ◎ 留学欧洲 / 36

049 二 呕心沥血： 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

杨志玖先生谈到旁听傅斯年讲课的感受时说：1934～1937年，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，曾旁听过傅先生讲先秦史专题课，我虽不能完全领会他讲课的内容，但对他发表的独到见解，对史籍的熟悉，旁征博引，融汇中西的学识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，却深感新奇和钦佩。他时而背一段《左传》，时而翻一篇英文文献，中西互证，左右逢源，宛如一位表演艺术家，听他的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。

- ◎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 / 50
- ◎ 抗战前史语所的发展 / 58
- ◎ 抗战时期史语所的迁徙 / 66
- ◎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就与贡献 / 71

085 三 学术成就： 史科学派的主帅

20世纪30年代初，傅斯年在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的时候，提出了一个十分显明的但也很容易被误解的纲领性口号——“历史学只是史科学”。后来他又用“史学便是史科学”，“史学本是史科学”表述这个口号。把史科学提到了与史学对等的地位上，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后来便有人称以史语所为代表的学术派别为“史科学派”，傅斯年也由此赢得了史科学派“旗手”和“舵手”的大名。研究傅斯年的史学思想，首先须对他的“史学只是史科学”的思想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说明。

- ◎ “历史学只是史科学” / 86
- ◎ “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” / 95
- ◎ 考论古籍，纵论百家 / 114

301 七 回归教育： 在台湾最后的岁月

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更重视自己人格的独立，不像政府官员那样具有严重依附和等级思想。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立场和意识。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，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，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，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。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，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、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，并通知傅斯年到场，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，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。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，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，蒋介石、麦克阿瑟和傅斯年，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，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，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，口叼烟斗，翘着右腿，潇洒自若。当时报纸新闻说：“在机场贵宾室，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，唯傅斯年一人。”有人曾引《后汉书》范曄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称赞傅斯年：“隐不违亲，贞不绝俗，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吾不知其他。”傅斯年一生不从政，从事教育和学术，努力保持个性独立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“道统”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，他要求教育独立，并为之努力奋斗，在当时是可贵的。

- ◎ 临去徘徊 / 302
- ◎ 整顿台湾大学 / 303
- ◎ 争取教育的相对独立 / 307
- ◎ 参与台湾政治 / 309
- ◎ 身殉台湾大学 / 314
- ◎ 主要教育观点及历史地位 / 317

325 参考文献

329 后 记

一 求学岁月：贯通中西学问

当时北京大学传统国学章太炎学派势力强大。傅斯年深厚的国学功底，尤其对章氏之学的信从，引起一些太炎弟子的看重，刘师培、黄侃等人都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，希望傅斯年能够继承仪征学统和章太炎学说，成为他们的衣钵传人，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后继有人，并将其发扬光大。傅斯年初期亦想在国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，入本科不久，便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。据记载，傅斯年当时常穿大袍褂，拿大葵扇，俨然一个地道的儒生。

〔家世与家学〕

〔国学奠基〕

〔五四运动的旗手〕

〔留学欧洲〕

一 求学岁月：贯通中西学问

家世与家学

傅斯年字孟真,1896年3月26日(旧历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)出生在山东聊城北门里祖宅。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典型的书香门第、破落的官宦世家。傅斯年在家乡生活了13年,幼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和接受的教育,在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方面打下了深刻的印痕。

(一)开代文章第一家

傅斯年的故乡聊城,自古是华北平原上的重镇。春秋战国时期,其地属齐国,西接韩赵,北通幽燕,南襟鲁卫,既是兵家争战之地,“筑城屯兵为齐之要地,各国诸侯皆争衡于此”^[1],又是齐鲁文化、三晋文化及戎燕文化交流融汇之处。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汇使得该地区文化积淀丰厚,内涵丰富多姿,虽说不上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,但也孕育了不少风流人物。才智卓越之士、谋国经邦之臣历代不绝,鸿儒贤相连翩鹊起,骚客智士蜂涌辈出,如伊尹、马周经邦之才,程昱、王旦谋国之忠,鲁仲连、华歆处世之智,孙臧、王颜章治军之能,都是彪炳史册的。

聊城自汉代置县,延续至今,一直为地方州府县治所,是华北平原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元代定都北京(时称大都),聊城成为近畿地区。元王朝为交通便利,开会通河。大运河穿聊城而过,聊城更得南北交通之便,北通京师,南连三吴,被史家誉为“漕挽之咽喉,天都之肘腋”,“江北一都会”,交通便利,加上物产丰富,促进了经济的发展。到明清时期,聊城及周边地区,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和纺织品的贸易中心。天下豪商大贾云集,“往来船舶,络绎不绝”,“兵民杂集,商贾萃止,骈檣列肆,云蒸雾滃”,以致城内“贾寓旅舍,几不能容。”各地商人竞相在聊城内兴建会馆公所,开办商号、店铺、作坊,与本地工商业者所建交错布列,鳞次栉比,使聊城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,在明清两代一直为山东西部三大商埠之一。

交通的发达,经济的繁荣,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昌盛。明代中期以后,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,书院林立。文人骚客,儒士缙绅来此会客访友,传播学术,交流信

[1] 明·于慎行:《东昌府城重修碑》,载《聊城县志·艺文志》。

息,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发达,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,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。据记载: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4047人,状元11人,其中隶属于东昌府州县籍者,进士290人,状元3人,仅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,状元2人。由此可见,明清时期的聊城确实是“科目鼎盛,贤士辈出”之地,被视为鲁西“八股文化”的中心不无道理。

显然,在明清时期,某些地区因得天时地利,经济发达,文化昌盛,尤其是儒家文化得以广泛传播。社会教化与文化昌盛是同步的。在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的地区,自然是教化普施,民风醇厚,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理念深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。考察聊城的历史,明清时期形成的聊城世风明显具有这种特点。这个时期兴起的几个家族和大批官宦士绅,差不多也都具有这种特征。《聊城县志》记载:“其人朴愿而茂,虽循习故事,惮于兴革,然无有桀黠渔食,持长吏长短者。租赋不待督,辄先期报竣,最称易治。”世风醇厚是文化发达、社会教化的结果。而醇厚的世风又陶冶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循吏良士。因此,这个地区“士多才俊,文风为诸邑冠,武风亦极一时之盛。”文化昌盛,其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就高,社会发展也相对健康,具体表现是孕育和培养了几个大的具有书香传统的世家大族。这几个书香世家的传承和发展,不仅代表了聊城当时的世风,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传统社会的缩影。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则凝聚着社会文化的基因,表现了深厚的区域文化的积淀。傅斯年一生的性情和品格就具有这种区域文化的特征。

传统史书将明清时期聊城的世家大族归纳为“八家”,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任、邓、朱、傅、耿、杨诸家,这几家大都兴起于明中期以后,其中任、朱、傅都发迹于清初,杨家则在清中期兴起。几家的共同特点是:第一,初始阶段,致力于研习儒家经典,经科举取得功名,进入仕途,逐步升迁,进入统治集团核心。第二,恪守儒家信条,以忠孝节义相标榜,忠君、孝亲、敬老、爱幼、和睦家族、友爱乡里。第三,重视教育,尤其是重视儒家文化的教育,培养子女,进行封建道统的说教,使子孙代代成三纲八目的典型,维持家族的名誉、地位、传承。第四,由于几个家族都遵奉儒家文化,世代从科举正途出身,又多是亲民的官吏,所以各家族往往以忠正廉洁、率直敢为相标榜,各个时代都出现了一些忠臣廉吏,孝子贤士。这些人又多在家乡设立条教、制定乡规民约、表率乡里,由此形成了忠义贤良、勇敢向上的世风,造就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良义士。傅斯年家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家族。

傅斯年所出身的聊城八大家族之一的傅氏,初发于明中期,兴盛于清代初年,逐步发展成为聊城的名门望族。

傅斯年远祖名叫傅回祖,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(今江西省永丰县),明朝宪宗

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,当时聊城为东昌府府治,冠县为其属县。傅回祖生有七子,任满返回故乡,其夫人李氏不愿随行,于是傅回祖便携四子南归,留其三子侍奉夫人,这三子一居冠县,一居博平,一子名叫傅祥,居聊城,是傅斯年的直系祖先。

当时聊城正是经济文化发展上升时期,大运河穿城东而过,北通京师,南达三吴,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,经济、文化都在迅速发展,形成了鲁西“八股文化”的中心。傅祥及其子孙,借重聊城的经济优势,靠经商起家。他出身官宦家庭,本人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,且处于浓重的八股文化环境之中,因此,十分重视诗书传家,督责子孙攻读举子之业,学习八股文,每每亲自“口授章句”,并“引古人及郡先达”激励他们奋发向上,建立功业,故而傅氏家族逐渐形成了诗书传家的传统,代代相继。

傅祥五传到傅以渐,终于振兴了傅氏家族,奠定了傅氏名门望族的基础。傅以渐字于磐,号星岩,生于明万历三十七(公元1609)年,7岁入塾馆系统学习儒学经典,曾从师于当时名儒孙兴等人。由于明朝末年宦官专权,社会黑暗,政治腐败,科场舞弊成风,傅以渐直到35岁仍未取得任何功名。1644年,江山易姓,清廷入主中原,为了搜罗人才,笼络士人,入关的第二年,便恢复科举制度。傅以渐投身科场,乡试中举,翌年(1646年)入京会试,得中贡士。殿试对策时被擢为一甲第一名,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,授内宏文院修撰,后累次迁升,1654年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,次年,加太子太保,改为国史院大学士。1658年,清仿明制改内三院(内宏文院、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)为内阁,逐步确立三殿三阁制,授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、兵部尚书职衔,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。为示恩宠,顺治帝又封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、祖父傅天荣、父亲傅恩敬俱为光禄大夫、少保加太子太保、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之勋号。自此以后,聊城傅氏便荣冠当世,泽及后代,成为鲁西的名门望族。

据史书记载:傅以渐“方面丰颐,颔下多髯,伟腰大腹”,居官尚称清廉,“每闻百姓疾苦,若切于身,闻里有义举,必赞成之。自处无异寒素,汲浆后进,惟恐不及,未尝有疾言遽色”。^[1]但是傅斯年成人后,从不向人提及他这位宰相祖公,更不引以为荣,其原因是傅以渐在明清易鼎之际,出仕清朝,有违汉族士人的民族气节。由此可看出傅斯年的民族意识。

傅以渐以后,傅氏成为典型的官宦世家,获取功名,中举人、进士、为庠生、太学生者不下百余人,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。傅以渐三传至傅继勋,字玉溪,号湘屏,是傅斯年的曾祖父,道光五年(1825年)拔贡,官至安徽布政使,清末名臣李

[1] 傅乐成:《时代的追忆论文集》,(台)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,第114页。

鸿章、丁宝桢都是其门生。傅继勋有子七人，其第三子傅淦，便是傅斯年的祖父。

傅斯年在填写个人简历时往往上至曾祖父，但是他出生时，曾祖父已去世多年，曾祖父以上对傅斯年的影响都是间接的。直接影响傅斯年个性和品格的是傅斯年的祖父和父母，其中在家庭方面影响傅斯年一生品行和思想作风的，主要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和母亲李夫人。

(二) 书香世家

傅淦字笠泉，生于道光二十五年(1845)年，少负才名，博通经史，工诗书画，尤以书法知名，且文武双全，又精通医道。同治十二年(1873)年拔贡，但他自甘淡泊，不乐仕进，取得贡生资格后，便绝意仕途，终生不参加科试。平生性情友善，重孝悌，且好交游，乐善好施，赴义唯恐后人。傅淦兄弟七人，他排行老三，析籍分家时，他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，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厰。由此可看出他的作风和气度。傅淦娶山东淮县陈阡之女陈梅为妻。陈阡官至江西巡抚，陪送女儿的嫁妆颇丰，但傅淦书生本色，轻财重义，不善理家，又无固定收入，分家以后，坐吃山空。婚后不久，长子旭安出世，接着次子、三子相继出世，人增物耗，家财日减，日趋没落。为生活所迫，他不得不违心地出外谋职以养家。正好，此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，来信让傅淦去天津，打算为这位世弟安排一个职务。傅淦接信后考虑再三，决意去天津一次。他到天津去督署见李鸿章时，正值李鸿章有紧急公务，只安排他住安徽会馆，准备处理完公务，第二天同他面晤。傅淦甚不高兴，以为慢待自己，次日一早便不辞而别。李鸿章第二天去安徽会馆寻他不见，才知已回山东，气得顿足叹气^[1]。

傅淦自此不再外游，或教塾馆挣钱养家糊口，或靠卖字画换些润笔贴补家计。无奈杯水车薪，加上不善谋计，随意使用，不够便典卖夫人嫁妆，夫人嫁妆虽丰，但不到几年也几乎典卖一空，从此更是入不敷出，家境进一步衰落。

傅斯年出生时，虽其相府宅第还巍峨壮观，其院落尚相当齐整，标志门第显赫的“相府”与“状元及第”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，二重门上的御笔“圣朝元老”横书金匾、门框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对联“传胪姓名无双士，开代文章第一家”依然引人注目，但这些装饰已无法遮掩日趋衰败的景象，只不过如《红楼梦》所说：是“百足之虫、死而不僵”而已。尽管如此，傅斯年的出生依然给这个日益破落的世家带来了喜悦。

傅旭安得此贵子，喜不待言，傅淦52岁得此长孙，更是分外高兴。据记载，傅淦自傅斯年出生，就不再远出，以含饴弄孙为乐。在傅斯年3、4岁时，就开始教其识字，背

[1] 傅乐成：《时代的追忆论文集》，（台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，第122页。

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等蒙童读物。傅斯年同乡、同学聂湘溪曾介绍傅斯年祖孙二人生活情况说：“孟真4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，每到破晓，尚未起床，便口授以历史故事，从盘古开天辟地，系统地讲到明朝，历时四年，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，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，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，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成就，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。”^[1]

傅淦自己痛恨清末政治黑暗，不愿入仕，颇有疾恶如仇的正义感，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政治态度。他有一次出外游历，行至山西介休，有两个宦官充军西北，道经此地，其中一个忽染重病，求傅淦诊治，他拒绝说：“生平不为无鸟之人看病！”另一宦官长跪哀求，他不得已答应。病愈后，宦官赠他银两，他把银子从门中掷出，并且说：“生平不要无鸟者之钱。”^[2]之所以如此，他以为历代弊政，许多是因宦官干政而致，而明清两代后期尤甚，因此痛恨宦官。由此事看出，痛恨宦官干政是傅淦淡泊功名的原因之一，不满清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，不愿为之效力，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。他对傅斯年讲述的二十四史历史故事，也必然带有自己的感情，对历史人物进行别择与褒贬，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影响。

傅淦自甘淡泊，但对傅斯年的教育毫不放松。傅斯年不满五岁，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入了私塾，并且选了最好的塾馆。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孙达宸，也是一名拔贡，学问好，有文才，教书认真且教学有方，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达40余人。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北街路东，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，步行上学比较方便。在孙氏塾馆就读一段时间后，与傅家有世谊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，因朱家离傅家更近，加上世交，于是傅斯年与朱家子弟朱笠升等人一起，转入朱家塾馆就读。傅斯年放学回家后，其祖父则在家课读，督导他读书习字，不准其有丝毫懈怠。

傅淦的教诲，对傅斯年一生影响甚巨。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说：“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，尽是忠孝节义，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。我兄弟得有今日，都是祖父所赐。”^[3]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，为人常怀侠义之心，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。

对傅斯年影响较大的另一位亲人是傅斯年的母亲。傅斯年母亲姓李，闺名叔音，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。李夫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，虽然识字不多，但却接受了严

[1] 李裕桓：《聂湘溪谈傅斯年》，《联合周报》1990年12月24日。

[2] 傅乐成：《时代的追忆论文集》，（台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，第121页。

[3] 傅乐成：《时代的追忆论文集》，（台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，第124页。

格的家庭教育，贤孝识大体。傅斯年父亲中年病逝，李夫人既要孝养高年公婆，又要抚育幼年双子，家境日趋贫寒，可以说克勤克俭，备尝艰辛。但李夫人颇有器识，一身承荷家庭重担，百般筹划，维持全家生活。由于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，待遇友朋学生以恩义相接，去世后，友朋学生对傅家颇为关心。他们共同凑集一部分钱，托傅旭安的两个学生周祖澜、范玉波二先生代存生息，维持傅氏家计。弟子们感念傅旭安生前恩德，每年春节前，相约派一人来聊城，给师母送来一些春节所需食物用品，并在聊城的商号里为傅斯年存一些银两以贴补来年家用。李夫人一家五口，没有其他生活来源，单靠这些实不敷家用，尽管她精打细算，百般节省，生活仍日益窘迫，难以维持。有时万不得已，她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，但这些都只能解决一时急需，不能作为长久的生活来源。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江河日下，一日不如一日。到了后来，房屋破旧损坏，亦无力修补。据记载，每逢下雨，李夫人便抱着幼子，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，其家庭状况可见一斑。即便如此，李夫人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，一切费用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，不使兄弟二人失学，并母兼父职，督责甚严，斯年兄弟如有过错，立予责罚，形成了无上的权威，据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回忆：直到傅斯年成名以后，李夫人一旦发怒，傅斯年便长跪不起，李夫人息怒后，傅斯年才温言劝说解释。

李夫人娘家在乡村，有时傅斯年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小住，因而对农村的生活有所体验，对贫困农民的生活有较详细的了解。十几年后，他撰写了《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》，就是他这个时期的观察和了解之所得，也是他后来积极提倡社会革命、改造国民性、推行农村改革、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等思想的基础。他在文中强调：“我虽是山东人，过了儿童时代，即不常在山东住，而且东部各县的情况我是茫然，我只对于济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亲身观察过……所以我现在专记山东一部分的社会的一部分——农民社会——所说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识”^[1]他在文章中对鲁西一带农民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，如他对农民一天的生活记述说：

一个农夫在农作时的一日生活如下：晨五时起来，整备好用畜和用具，赶紧吃了早饭（或不吃，待人送），赶到地上，工作到午；家里的人把午饭用罐子送去，就地吃了，再工作到四时，忙时乃至六七时；回家，吃晚饭，趁空磨面、碾米；八九时就寝；但夜间以须饲牲畜之故，起来三四次。在收获时，有时须借月光在田中或场上劳动，必在地头上

[1] 欧阳哲生主编：《傅斯年全集》第1卷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61页（以后凡引用此书，只注页码，不再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）。

睡觉,所以劳动的时间竟达二十余小时。若当恰恰成熟时,怕被人偷或天气改变,便彻夜不眠。一个农妇的一日生活如下:晨四五时起来,煮饭,饭后洗濯器具。午间又是如此一遍。晚餐时又是一遍。有小儿女的,自然要伺应他;不过除吃好奶时,都是用布束着,放在一旁,有时放在沙土布袋里。到四五岁时,就全不管了;七八岁时,便要帮大人工作了。农妇管田地以外的一切农家事务,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,还有晒菜、磨面、喂猪等等职务。纺线、织粗布、缫丝、编帽辫,都是整日彻夜的工作。

农民除春节能休息几天外,一年到头如此,一生如此,并且永远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,“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,如鞋、帽、染衣、弹棉、织、纺、编筐、制咸菜,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。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,是极不分工的生活”。^[1]几千年来,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养成了农民的愚昧、保守,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。因此,要促进经济发展,社会进步,就要通过教育,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。傅斯年幼年时对农民生活的真切了解,成为他日后提倡社会改革,以缩小贫富差距,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思想渊源。

国学奠基

胡适曾在给别人的信中,议论人思想能力形成的原因。他说:“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,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。……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,它的来源最广,从母亲、奶妈、仆役……到整个社会——当然也包括学校——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。在那个广大的‘做人训练所’里,家庭占的成分最大,因为‘三岁定八十’是不磨的名言。”^[2]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人一生的思想、知识和能力是在少年时期奠基,外来的影响除学校外,主要是家庭和社会。考察傅斯年一生所受的教育和人格锻炼,主要分两个时期,即以13岁为界,13岁以前生活在家乡,主要是学习以五经四书为主的传统文化知识,其人格培养与锻炼主要是家庭和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。

(一) 私塾与学堂

傅斯年幼年是在家庭完全衰败又屡遭变故中度过的。尤其是9岁时父亲去世,一家老弱失去了唯一的壮年亲人,也断绝了主要的经济来源,其生活更加窘迫。这种变故对傅斯年心理上有影响,但对其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显著,经济生活方面的重荷都由

[1] 欧阳哲生主编:《傅斯年全集》第1卷,第368页。

[2] 胡适致叶英信,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307页。

祖父和母亲苦苦支撑，他本人仍在亲人和塾师的督责下，一天到晚苦读诗书，死背儒家经传典籍。这个时期奠定了他少年时期传统国学的功底，以致他成年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，对古代典籍的熟悉几乎使所有学生和同事惊羡不已。

傅斯年的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时期，这种变化影响了他的生活环境和人生趋向。

1901年，在戊戌变法的热浪中，清光绪帝下诏改科举、废八股。9月，清政府又下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，各县设小学堂，实行新式教育，这在当时无疑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。然而此举在偏僻落后地区很难立刻发生影响。聊城虽是东昌府治，诏令初下时，城内的府学、私塾中的生徒们，依然在那里读经书，学作八股文，整天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地背诵儒家经典。傅斯年就是这样的环境中，熟读了十三经，奠定了其传统国学的基础。建立新学堂、废除科举制在当时是时代潮流，如春风总有一天要吹遍大地，东昌府和聊城县势必受其影响。不久，原启文书院便改为府立中学堂，摄西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，原来的考院改为初级师范小学堂。1905年春，傅淦顺应时代风尚，把傅斯年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。当时的小学堂虽设算术、地理等新课程，但未完全摆脱传统，照常要读经传、诸子之书。傅斯年曾追忆说：“清末改革教育……当时竟移书院中之科目，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。”即便如此，傅淦仍担心傅斯年入“洋学堂”学不到真学问，继续坚持在课余时间督导傅斯年学习儒家经典。对于当时学堂学习的内容，傅斯年后来回忆说：“清末，一面在那里办新学，一面在那里读经，更因今文为‘康梁逆党’，不得用，读经乃令与现物隔开。上者剽窃乾嘉，下者死守高头讲章，一如八股时，那时学堂读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。少年学生上此课时，如做梦一般。”^[1]

由是观之，傅斯年虽然读了几年高等小学堂，但所学的内容并没有摆脱传统国学的窠臼，只是接受了很少一点近代科学知识而已。

就目前所得资料来看，傅斯年从5岁入私塾，到他13岁离开聊城，这8年间，不论是在私塾还是在府立高等小学堂，他始终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学生，学习成绩却总是最好。传统的说法总结为他天生异质，禀赋聪慧，实际并非完全如此，更重要的原因还有两个：

其一，勤奋好学。他能集中精力于学业之中，对其所学，必求正解，自幼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。平时读书，凡遇到不识的字，不懂的词，难解的句子，总是要问个明白，

[1] 傅斯年：《论学校读经》，《傅斯年全集》第6册，（台）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，第55页。

有时教师不在身边,他便记下来,有机会时请教教师或祖父。遇到问题,若身边无纸,年幼的他便信手写在上、臂上乃至大腿、肚皮上,久而久之,养成了这种“记笔记”的习惯,因此,他的衣服往往被弄得墨迹斑斑,母亲为他洗衣时,颇费气力。这是其母晚年常向人们说起的趣事,傅斯年学习的刻苦认真从中可略见一斑。

其二,良好的学习环境。傅斯年家庭虽然完全破落,生活困难,但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宁肯自己艰辛操持,也不把生活的重荷让孩子承担,只希望他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。所以家虽贫寒,其学却无太大经济压力。在学习上,其祖父督导,严而不苛,诲而不倦。上学之余他可以在深宅大院里安静地读书、习字。这种良好的环境是他学好课业的必要条件。

傅斯年在塾馆与高级小学堂学习时,由于勤奋,每一门功课都名列前茅,深为同学敬佩。他塾馆时的同学朱笠升,在同学中年龄最长,同学们都称他为大学长,他与傅斯年关系亲密,由于功课不如傅斯年,经常向傅斯年讨教。傅斯年与他开玩笑,戏称朱笠升为“大徒弟”。

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,知识面宽博,善于属文,其作文为其他同学所不及。每次作文,先生出题之后,傅斯年略作思索,便奋笔疾书,常常一挥而就,却可得到先生的赞许。而其他同学看到题目后往往趴在书桌上苦思冥想,半天写不出几句话来,于是有些富家子弟便想投机“作弊”,他们求傅斯年代其作文,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买一个烧饼作为报酬。傅斯年自幼仗义,乐于助人,有时又碍于情面不好推却,写篇作文对他来说也不算难事,所以不管给不给烧饼,他一律慨然应诺。有时,他竟能在完成自己的作文之后,再为两位同学写出内容不相重复的作文。这种儿童把戏,自然难逃教师的慧眼。后来,每发现傅斯年代写文章并了解真相后,教师评讲作文前常戏问傅斯年:傅老大,你这次是不是又换了两个烧饼。傅斯年不好意思回答,只好投以幽默的一笑。老师自然只是开导,并不严厉处置。傅斯年在聊城度过了儿童时代,这个时代对傅斯年个人而论,是颇为特殊的,其特殊性可从两个方面分析:

就大环境而论,他童年生活的聊城正处于变革的转折时期。首先,聊城地区的经济发展日趋停滞,原来运河航运发达,促进了商业、手工业的发展,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和进步。而此时由于黄河改道,大运河河道堵塞,再加上海运兴盛,其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消失,于是,聊城的农业又回复到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时期,农民生活更为贫困。但原来经济发展时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部分地保留下来,仍然影响着社会。这在当时有明显表现。傅斯年后来对此也有所认识,他说:“山东西部在当年并不是不济的地方。有一条运河和南北大道,所以当地是很富庶的。也就是因

为当地富庶，一般工人和农民都不肯迁地求事业，远不如东部的人的精神（当时，山东东部的生计艰苦）。譬如就聊城县一地而论，聊城在当地是山东西部三大埠之一（三埠是济宁、聊城、临清，商务在济南之上），又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‘八股文化中心点’，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，而多怠性。……现在经济上状况一落千丈了，只有当时造成的恶根性存在着，妨害生活的发展。八股文化也无用武之地了，但仍用着旧精神妨害新文化的进来”^[1]。由于形成八股文化中心点，使这个地区的士人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和八股文的写作，希望靠此途径获取功名，混上一官半职。因此上学就是习举子之业。傅斯年就在这种文化气氛中度过了童年时代。这种大的文化环境，使他在童年时期系统地受到儒家文化的濡染，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复杂影响，其正面影响是得以奠定深厚的国学基础；其负面影响是，使他在儿童时期没有机会接受近代科学知识，这制约了他知识结构的全面发展，特别是心理健康发展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我小时，有一位先生教我‘正心’，‘诚意’，‘不欺暗室’，虽然《大学》念得滚熟，却与和尚念经一样，毫无知觉。”^[2]这说明童年枯燥无味地死记硬背儒经，严重妨害了他的成长。他成年后坚决反对让中小学生读经与此经历颇有关系。又由于童年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，所以他后来强烈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，反对贫富不均。

就小环境而论，傅斯年生活在破落的书香世家，这种家庭环境对他一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，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其一，他的家庭是个比较典型的书香世家，所谓书香世家一般说来有两层含义：一是重视文化的传承，即世代重视对子弟的文化教育。从傅斯年很小开始，其父祖就教他识字、读书，尤其是他的祖父，以向孙子传授文化为自己最大责任，一刻也没有放松，这对傅斯年文化知识的学习具有重要影响。二是重视品德教育。旧时的书香世家几乎都希望自己的子孙有所成就，建功立业，对自己子弟的教育都具有如何对待社会、人生的内容。傅斯年受的家庭品德教育，可以说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，要求其忠孝节义、建功立业、忠君爱国等，这对傅斯年思想的形成和一生的节操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
其二，傅斯年出生时，他的家庭已经完全破落，尽管其父祖都曾取得功名，还属于士大夫阶层，但经济上已到了求温饱而不可得的窘困境地。这使傅斯年不仅没有染上传统纨绔子弟的作风，反而备尝贫困子弟的辛酸，在幼小心灵里奠定了人生维艰的意识。他曾不止一次叙述自己早年的生活，如：“我出身于士族的贫家，因为极穷，所以

[1] 欧阳哲生主编：《傅斯年全集》第1卷，第371～372页。

[2] 欧阳哲生主编：《傅斯年全集》第5卷，第490页。